

我的中國心

盧龍光（本社名譽社長）

《景風》是國際漢學界聞名的刊物，因為這是世界上唯一以「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期刊。雖然中文版的《景風》已經在1993年停刊，但英文版的《景風》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歲月，仍然繼續在這個領域內努力（雖然艱苦）地肩負著起初的使命。

我首次接觸《景風》，剛好是在卅年前。當我在1973年進入崇基神學組受神學訓練，《景風》（中、英文版）內刊登的不少文章，是「宣教學」及「中國基督教史」課程必讀的文章，它們擴闊了我對宣教的了解，更開闊了我對中國基督教在本色化／本土化的歷程上的眼光。

其實，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充滿了民族思想的家庭，父母便是在抗日戰爭的前線認識的，他們當時都有軍階在身。自懂事以來，家中來的客人與父母的談話內容，總離不開國家大事，無論是歷史或是現狀。這種對國家民族的承擔感與使命感，不但驅使我這個讀英文書院的理科學生對中國文學和歷史產生了興趣，更促使我決定去台灣讀農學院的森林系；因我的了解是中國以農立國，農民是中國最主要的人口，只有振興農業，中國才可以富強。

這種中國情懷曾使我對基督教在生命中的核心位置產生了矛盾，究竟中國抑或基督，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直至我將基督與中國放在一種垂直的關係上——「基督超越中國，但亦住在中國之中」——我的心才得以平伏，也使「基督—中國」的結合成為我人生的方向。

我的簡樸中國心，驅使我在一九七五年，文革還未結束，便單人匹馬回到我從未去過的故鄉（廣西省的偏僻鄉村）探望親人，使我經歷了中國的土地與人民那種純樸的關係與感情，對中國的苦難與尋索出路的實況有了第一身的感受。中國對我而言，已包括了香港、台灣、大陸的生命連結與經驗。

我的中國經驗對我閱讀《景風》的文章帶來更深的體會，並且提高了我的眼界。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宗文社」更率先與剛剛重新開放的「三自教會」建立密切關係，使我有機會從更多的角度了解中國的教會。而「宗文社」的骨幹，李景雄牧師和鄧肇明先生，一位是我同一宗派的牧師，另一位是我的希臘文老師，他們對中國和中國教會持續的熱情和委身，使我深受感動。

今天的中國，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皆有所不同，變化之大，對一些未曾同步經歷的人士是難以理解的。上帝的恩典和帶領，不但使我在這段急劇變化的年代有機會獲得兩岸三地生活的體驗，更帶領我在這時刻，有機會參與「宗文社」和《景風》的工作。這是我從未想像過的。

「宗文社」在「中國」不斷急劇變化的年代也要重新定位，更新使命。在這時刻要擔任名譽社長的職位，領導「宗文社」的責任，實不容易，但我看作是上帝的召命。

盼望在上帝的繼續帶領和眾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弟兄姊妹支持下，「宗文社」必不負所托，繼續服事中國，服事教會，服事關心中國基督教的中外朋友。